

《震川集》的清代未刊评点五种*

杨 峰

清初至民国初,归有光的散文曾被很多文人选评或者评点过,除黄宗羲、陈维崧、崔征麟、曾国藩、林纾、徐世昌等人的选评本在当时已刊行外,尚有董说、鲍倚云、张士元、王元启、庄述祖等十数家的评点资料并未刊行。在辑录诸家评语时,笔者深感其大有益于归氏散文和清代文学批评的研究,故择五家概述如下。

一、董说的评点

董说(1620-1686),字若雨。他对《震川集》的评点流传颇广,今国家图书馆、复旦大学图书馆、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等俱藏有过录本,除个别字句偶有差别外,书中的绝大多数评语相同。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为康熙间归庄刻本,此本汇集了董说、钱谦益、彭绍升、冯伟等四人的评点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此本为清人季锡畴过录本^①,其目录后有跋语一则:“墨笔临牧翁原阅本,黄笔临宝云上人阅本,蓝笔临彭尺木先生选本,朱笔临仲廉先生手抄本。钱本从言氏传录,上人本从吴氏临本度得,彭本有刻,冯本假诸汪氏。”跋语后钤有“臣锡畴印”、“范卿”朱印,清人季锡畴字范卿,故《善本书目》著录有据,此本当是由季氏过录。

由董说评语可知,他评点此书时已近晚年。《跋程策后》后有评语曰:“震川先生诸跋皆大文字。六月三日大风,独坐水堂记此。”《昆山县倭寇始末书》后评语又说:“六月乙亥毒热,展卷如坠尘沙。又卷中叙述都令人感忱。记吴中一名医言,老人不可使眼见愁苦文字。又先师言:‘避暑只看名山记。’”《贞节妇季氏墓表》的评语记明年份:“戊午夏,评论归先生近刻集至二十三卷,入吴中一年,

* 本文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6 年度重大项目《明清时期未刊文学评点的整理与研究》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编委会: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(下)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722页。

未之及。今岁十月复理，大雷雨之明日也。”卷三十末的评语则指明了评点结束的时间：“戊午夏读此集，未竟，入吴。己未秋，复寓水村，始读至三十卷。”董说的评点作于其五十八岁至五十九岁之间，因此这些评语除了有助于研究归有光的散文外，对于研究董说晚年的文学思想也大有裨益。

董说在评点中对归氏经学重宏博、文学讲事功的主张表示了赞同。他评《经序录序》“而学校科举之格，不免有唐世义疏之弊，非汉人宏博之规”三句说：“论经学而取‘宏博’二字，亦伤心甚矣！然比世之株守朱注者，则宁看李氏《易解》耳。譬之同一毒药，或中其药可救，或中其药不可救也。”将株守朱注视为不可解救之“毒药”，可见他对当时孤陋学风的厌恶。他评《跋小学古事》“余少时初入学，见里师必以小学古事为训。时方五、六岁，先生为讲苏子瞻对其母太夫人及许平仲难师之语，竦然知慕之。自科举之习日敝，以记诵时文为速化之术。士虽登朝著，有不知王祥、孟宗、张巡、许远为何人者”时说：“‘速化’二字宜标出为家训，使后学不堕其业。科目之学使天下无读书之人，使人生无读书之乐，哀哉！”并总评此篇说：“读此而不痛哭者，可谓不仁。”又评《三江图叙说》“诸儒胸臆之说，不足道也”一句说：“为经史、为经济、为诗文，未有不坏于‘胸臆之说’四字。”明代中期以后，不少文人以记诵肤滥时文猎取功名，八股取士的弊端越发为世人所注意，归有光八上公车而不遇，其体验也真，故发言也切。董说等明末遗民身历亡国之痛，往往将明代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学术，故对学风的认识与归氏颇有同感。另外，归有光还十分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，这也获得了董说比较强烈的回应，他评《与李浩卿书》中“少好《史》、《汉》，未尝遇可以发吾意者。独此女差强人意。又耳闻目见，据而书之，稍得其实。要以示千百世之后耳”数句说：“此数语真著书人心事，不具此心事而漫下笔者，但妄人耳。”评《与宣仲济书》中“使者徒知籍天子命作威福，宁复知纪纲风化为何物？此亦非一日矣。然龙逢、比干，当时亦何尝旌表哉”数句时说：“朝廷知此言则可以立政，世人知此言则可以立身。”归有光曾为受恶棍害死的张氏女辨诬，作《贞妇辨》，董说评此文中“谓不得为烈者，东土数万口无此言也，彼为贼地者之言也”三句说：“然则非归子之文，乃东土数万口之文，此一语可为作文之准则，可为读书论古之本源，表而出之，以告后学。”他评《玉岩先生文集序》“使公言获用，天下苍生，岂不受其福哉？此予所以读公之疏，于本朝否泰升降之际，未尝不三复而叹息也”说：“此尚论古今之法，此读前辈著述之法，此亦看《震川集》之法。”董说中年后退居方外，但这些评语却清楚表明他对世态发展和学术趋向仍然相当的关注，特别是他以“东土数万口之文”视作“作文之准则”，具有一定的“平民意识”。

他还指出归有光文章中的得意之文乃“生于情”，为“情话”，由此彰显了他在本人在诗文创作中的“主情”倾向。他评《抑斋先生夏君墓志铭》说：“吾读太史公诸纪传，不觉其为文字，直是一篇情话。归先生得意之作亦无不尔。”《纶宠延光图序》评语说：“天下文章之至者，情也。今人作无情不实之语，自命

曰文，可乎？”《高州太守钦君寿诗序》评语说：“一篇以得失离合为情寄，无世上同类文字恶语。”《京兆尹王公传》评语说：“‘永感’一段，文生于情”。归有光生当文学思潮多变的明代中期，并不强主师秦汉还是法唐宋，他在《与王子敬》中曾以花喻文说：“近来颇好剪纸染采之花，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花也。偶见俗子论文，故及之。”^①董说评语虽不乏自说自话，却也暗合归氏的主张。

他还指出归氏散文具有“闲”的特点。他评《詹仰之墓志铭》说：“闲心闲眼，总之，千古文章一‘闲’字尽之。”评《张通参次室钮孺人墓碣》说：“闲暇，人不闲暇不高致，文不闲暇不展拓。”评《周子嘉室唐孺人墓志铭》说：“大略文章真诀在一‘闲’字，世未有不闲而文能高古者，亦未有不真不切而能闲者。”《周封君传》评语还说：“文字总患不得闲，不得闲者患不得细，不得细者患不得实，文至于实而古今之能事毕矣。”他所讲的“闲”，有时是对归有光胸襟和气度的赞赏，有时是指较为具体的作文方法。对于如何使文章达到“闲”的境界，他认为写作中应该注意“细”、“实”、“真”、“切”，如归有光在《先妣事略》一文中追记了为刚去世的母亲摹画遗像的细节：“孺人卒，诸儿见家人泣，则随之泣，然犹以为母寝也，伤哉！于是家人延画工画，出二子，命之曰：‘鼻以上画有光，鼻以下画大姊。’以二子肖母也。”董说评道：“愈琐愈妙。”《褚隐君墓碣》一文，原文主要记述了褚隐君两件事：其父病将死，褚隐君去山神庙乞求神灵，“十步一膜拜”；母亲信佛，他“十五年不辍呗诵”。董说评此二件事说：“二事皆俚俗事迹，而引情深渺耳。”《东园翁家传》评语说：“‘作翠云朵歌’一段得烟云过眼披拂之妙，‘相其三子’数语，语涉谑而婉有致。”《吊何氏妇文》评语说：“只是乡里人说话，无不妙。”细味这些评语，这包含了董说对文章描绘“俚俗”事迹和“琐细”言行的肯定。归有光喜好《史记》，并以文章得《史记》之神为追求，董说赞赏归氏散文具有“语涉谑而婉有致”、“乡里人说话”等特点，既堪称归氏的知音，也见出他本人对《史记》文学传统的认同。

董说在评点中还表述了要求文章讲求寄托性的主张。他评《赠戚汝积分教大梁序》说：“虚处虚，得其所寓；实处实，得其所据。不得其据与寓，而虚者浮，实者腐矣。丁丑日记。”评《俞樾甫妻传》说：“作文字须自作此文字，作文字须不作此文字，作文字须不但作此文字。须自作此文字者，达意也。须不作此文字者，纪实也。须不但作此文字者，托远也。”元代的陈绎曾在《文筌》中论虚实说：“古文一主于实，实题实做，虚题亦实做，叙事则实叙，议论则实议，是也。时文一主于虚，虚题虚做，实题亦虚作，只此是古文时文分处也。”^②两相比较，董说的见解似更为通达合理。

①归有光著、周本淳校点：《震川先生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865页。

②陈绎曾：《文筌》，王水照《历代文话》据日本元禄元年刊本整理本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237页。

二、鲍倚云的评点

鲍倚云(1708-1778),字薇省,号退餘,又号苏亭,安徽歙县人。少有才名,中年以后不再应考,以优贡生教授以终,乾隆间状元金榜即其高弟之一,嘉庆间名进士鲍桂星则为其孙。有《寿藤斋诗集》、《退餘丛话》等著述传于世。鲍氏于经学、诗及古文诸方面俱有很深的造诣,姚鼐在《鲍君墓志铭(并序)》中说:“作诗歌、古文辞,皆有法,能见其才。”^①阮元在《寿藤斋诗集序》说“歙鲍退餘先生邃于经学,工于诗”^②。《民国歙县志》则称他“为诗文独抒性灵,一空依傍”^③。

上海图书馆藏有鲍氏评点《震川先生集》一部,亦为康熙归庄刻本,卷前有鲍氏跋语,但字迹剥落严重,其残存部分有如下字句:“《震川集》三十卷,曩点勘未卒业。……余索居无欢,遂得完未竟之绪,兼追理《宋史》,见诸论赞之妙。……余丹黄终卷,惜眼前无与共此乐者。念□明南村句,为慨然也。行当手授大儿嘉邕,存一副本以诒后人。乾隆乙酉五月廿三日后学鲍倚云谨志。”鲍氏的评点未知起于何时,其卒业乃在鲍氏58岁时的乾隆三十年乙酉,此年距方苞去世仅十五、六年,刘大櫆尚健在,姚鼐已于二年前登进士第。

鲍氏在评点中推举以“写得出”作为衡量文章优劣的标准。他评《张氏女子神异记》说:“邵武朱斐瞻士琇论古文以‘写得出’为妙,‘出’字极有意思。譬之观鱼,不工文者如鱼在水中,波纹荡漾,纵了了,终觉模糊。其工者如鱼釣り手,首尾鳞鳍纤悉毕出,此妙惟史迁得之。此文甚简,而字字精神涌现,盖具此妙。”《书张贞女死事》是《张氏女子神异记》的姊妹篇,二文所记张氏为同一人,文章记述了此女遭残害的许多细节,鲍氏评《书张贞女死事》时又说:“此事合集中前后论著札牍观之,见先生一腔热血喷洒处。作者气薄云霄,死者光争日月,其文之直处、琐处、粗俗处,悉本《史》、《汉》法,语言情状——如睹,《明史》即据此立传,先生之自命不虚,而贞魂亦差可目瞑矣。闻后来有以古文名者,颇肆讥弹,毋论其他,要其胸次先未磊落也。”鲍氏对“其文之直处、琐处、粗俗处”极为肯定,由此可知其“写得出”的主张,乃是要求作者据实直书,精心锤炼,使文章“字字精神涌现”。类似肯定归氏散文能以“琐碎”现“精神”的评语多次出现,如他评《先妣事略》说:“琐琐屑屑,约略点缀,而母之贤,子之痛,涌现毫端,涕泪满纸,事略至此,可称神品。”

参阅鲍氏其他的论述,可知其“写得出”的主张应是对方苞等人“雅洁”主张的有意反拨,他在《退餘丛话》中明确说:

本朝方望溪先生,道德气节耸身三代而上,……癸酉首冬,病餘,得

①姚鼐:《惜抱轩全集》卷一五,中国书店,1991年,第149-150页。

②鲍倚云:《寿藤斋诗集》卷首,清嘉庆十三年刻本。

③石国柱等:《民国歙县志》卷七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8年,第291页。

其全集读之，叹其经术闳深，义蕴充实，斤墨一本儒先。至叙忠孝节烈，精气垒涌处，信足廉顽立懦，不朽之业在是。凿然为千百年来古文大家。第余小子不揆狂妄，渐窥之而窃有疑也。就中持论往往近刻，文品过削，多可畏而不见其可爱，至骨肉天属之文，读之都无泪，时于献酬群心、是非毁誉间，隐隐有入主出奴、党同伐异之病。……第颂其文佳处，其墙壁倚程朱，而根柢则管荀也。史法宗龙门，而笔力则荆国也，渠但知龙门之洁耳，龙门之奇、之逸、之磅礴浩荡夭矫变化，无有也。荆国之冷峭、瘦硬、削质皆有之，而坚僻自是，好使人同己，如东坡所讥者，亦可称神似。顾往往侈口昌黎，昌黎之大何所不有，若是其隘耶？^①

《史记》成就卓伟，一直为后世古文家所效仿，无论归有光还是方苞，都不例外，而且二人都曾对《史记》写人叙事的经验进行过总结。鲍倚云对归文“琐处”、“粗处”、“直处”等特点给予肯定，认为能得《史记》“写生”之长；而以方苞“雅洁”为不足，这显然能纠正方苞等人持论时的偏颇。

鲍氏还认为归文具有多种风格，能兼唐宋诸大家之长，如“屈折淋漓，瘦硬通神，此文颇近荆国”（《守耕说》评语）；“总在辟阳明之教，而欲教谕为国家诸有真用之材。溯浙东道学渊源，以文成压阵，为青田士子大建旗鼓而振励之。其文雍容顿挫，酷似曾文定”（《送狄承式教谕表田序》评语）；“筹驭军制乱之略，为庙堂之大机，不特为南架部言也，坚光峻响，电掣雷轰，此文何其酷似老泉先生”（《送南架部吴君考绩北上序》评语）；“先生自谓可肩随欧曾，似此等固摹韩之作”（《方御史寿序》评语）；“逼真欧阳子，而议论深醇过之”（《张季翁墓碣》评语）等。自明代以还，论者往往认为归氏文风近乎欧、曾二家，如王世贞笼统评之为“继韩欧阳”，徐渭则誉之为“今之欧阳子”，鲍氏的评语有助于深化对归氏散文的认识。

此外，鲍倚云还赞誉了归有光的经术修养及多种精神品格。他评《草庭诗序》说：“精理泓然，妙机跃然，伊洛渊源烂熟于胸中，朱子嫡传在此。”评《送何氏二子序》说：“通人之论，唤醒讲学诸公不少。须知先生固深于经学，而得宋五子之粹者也。”评《都水稿序》说：“老孝廉既成进士，当莅官日而用意好学如此，且云恐遂汨没，令我起高山之仰，喟息久之。”评《书斋铭》说：“心神专一，时太山在前而不见，疾雷破柱而不惊，何有于儿童。鸡犬朝市喧杂，而以先生之斋如此，铭如此。今人有书堂静室而不能坚坐，扰之者奚为也？余持此论久矣，未能笔之，读是文字，使我首肯心肯。其文洒落超旷，奥美无穷，读之如游名山。铭辞理粹而气宕，可使才人学人一齐俯首。”归有光仕履平淡，但追求不凡，少年时精心向学，啸傲于项脊轩，为官后则以两汉循吏自勉，对社会弊病及民生疾苦甚为关注，情动于中而形于文章，鲍氏所评亦可谓知言。

^①鲍倚云：《退馀丛话》卷二，刘世珩《聚学轩丛书》本。

三、王元启的评点

国家图书馆藏有管庭芬过录王元启、张士元等人评点《震川先生集》一部,此书《凡例》后录有题识两则:“乾隆壬辰嘉平月依嘉兴王惺斋元启评点,惺斋一字宋贤,辛未进士,福建将乐令。袖堂记。”“道光庚戌冬,泰吉从沈廉仲借所藏本过录于海昌学舍。”书后有钱泰吉和管庭芬跋语各一,钱跋说:“往岁壬辰,平湖方子春广文垌示余其所评《震川集》,并录吴江张鲈江评本,余手录数叶。潘梧君茂才藁人见而喜甚,为录终卷。未几,子春下世,每一展读,辄思故人。今年,假沈廉仲(小湖侍郎之仲子)所藏盛秦川录祇平居士评本。梧君下世亦有年矣,鲜同嗜者,忍寒手录焉。祇平、鲈江文集皆已刊行,若仿诗家主客图之例,其于震川不愧上入室矣。梧君文稿余亦传录,惜乎未见其所止也。子春晚岁潜心理学,所作无多,不知尚可收拾否。道光庚戌长至后十日甘泉乡人钱泰吉识于海昌学舍。”管跋曰:“咸丰甲寅长夏海昌管庭芬湘甫临校一过,并订补附录中张鲈江《震川文钞序》一首。”管跋后钤“庭芬经眼”朱印。由以上可知,此本中王元启评语乃源自钱泰吉转录自盛百二过录本,管庭芬当时曾佐钱泰吉纂修《海昌备志》,故又从钱氏临本中录得。

王元启(1714—1786),字宋贤,乾隆辛未进士,翁方纲在《皇清例授文林郎赐同进士出身署福建将乐县知县惺斋王君墓志铭》一文中说:“幼即有志圣贤之学,不为时俗文字,……先生为学以宋五子为宗,说经尤精于《易》,而为文一本韩子,……先生博极群书,勤考证,工文词,而笃守程朱之旨。”^①

王元启主要生活于乾隆时期,正处于清代经学的兴盛期,故其本人也明显感染着当时的学术风习,他在评点中指出归有光在学术上博取众家而又深造自得,从而对钱谦益的许多评价做出反驳。钱谦益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》中说:“先生钻研六经,含茹洛闽之学而追溯其原本。谓秦火已后,儒者专门名家,确有指授,古圣贤之蕴奥,未必久晦于汉唐,而乍辟于有宋。儒林、道学,分为两科,儒林未可以盖道学,新安未可以盖金溪、永嘉,而姚江亦未可以盖新安。真知独信,侧出于千载之下,而未尝标榜为名高也。”^②王氏反驳说:“震川之于经学意在博存众家,参互考正,以求古圣人之所用心者,庶几有深造自得之益。若专守一先生之说,党同伐异,则剿其成言,而莫知其所以然,务名高,而不知求其本心之弊也。牧斋沿启、禊恶习,极诋宋儒,而震川又实宗朱子,遂为不可分可否之论,彼此糊涂,使人莫适为主,此真孟子所谓‘彼淫邪遁之辞’也。震川称曾、王二家《洪范传》远出二刘、三孔之上,则其优劣显有定论,安得谓‘圣贤之蕴奥未必久晦于汉唐而乍辟于有宋,姚江未可以盖新安’?《送王子敬序》言之

①翁方纲:《复初斋文集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清清李彦章校刻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,第1455册,第478页。

②归有光著、周本淳校点:《震川先生集》卷首,第7页。

‘新安未可以盖金溪’，则就所定《震川集》四十卷遍观之，从无一语及之，牧斋又何自而得之哉！岂非自出臆论、即意援儒入墨乎？至‘欲尽废五千四十八卷之书’及‘恍然见贝珠宫阙生天之处’，其语见于《赠坤上人之序》，然此亦所谓西子之曠，不足效也。况其言曰‘使世间果有佛’，即其理如是，犹未敢以其言为可信也，而竟质之以为笃论，其言不亦缪乎！”

王元启对归氏的送行文评价甚高，此书卷九前录有总评说：“集中赠送诸序为最胜，可追配昌黎，宋元以来诸大家所莫及。”再如以下几则评语：“原本经术，故其风骨独高。今人作文，未尝无好议论，然只是不根之游谈。于此服震川经术之湛深，所谓触处皆通，取之左右知其源者。”（《送福建按察司王知事序》评语）“此等文直与贾谊、陆贽相匹，不特经生之所不能言，而亦非文章家之所有也。”（《送县大夫杨侯序》评语）“公送吴纯甫叙，称其精于学，遂于文字，熟于事，此三句惟公可以当之，观公送行诸序，考究吏治，于国家前代之典章如举其家之故藏籍记。公亦尝自谓于国家之利害、生民之休戚，时有隐忧于其中。不具此副心胸，亦安能毅然命笔，纵横高下，一任其指挥而卓然与古作者为徒乎？”（《送同年李观甫之任江浦序》评语）“不朽之作，而文气亦直追秦汉。震川集序志文最佳，诸序中尤以此为第一，弇州所谓‘继韩欧阳’者也。”“送行文能用如此心胸，发出如此大议论，自昌黎以外吾未见有两也。昌黎集中如送董邵南、文畅师、李益、韩重华诸序，自柳欧以下诸大家集中皆未之有也。此文命意制局几与昌黎抗行，真可谓惊天动地之文。”（《送南驾部吴君考绩北上序》评语）

王元启对归氏的寿序文也甚为欣赏，此书卷十二前录有他对寿序类文章的总评说：“震川诸寿序中间必有一二语作骨，其烟云波浪率皆因此而生，其变化处至不可方物，而得力处殊不在多。此所谓宇宙在乎手，变化生乎身者耶。”再如：“震川文只落笔处一二语便定一篇之局，自后虽波澜百变，而皆不离其宗，盖篇篇如此，故能随方布阵，而无一成之辙迹可寻，其妙在一‘切’字。”（《顾孺人六十寿序》评语）“震川文其大意总在落墨一两行间，后只从此而细绎之耳。此文亦只尽于开端三十字，如此起则中后自合作如此布局、如此命意，必不可移。”（《周翁七十寿序》评语）“震川文只是一个精切而有条理，人徒以宽博目之，不知震川者也。然震川之精切又不如唐荆川文筋骨尽露，使人骤阅之，若不知为精切者，此所以独成其为震川之文也。然则徒以精切目之，抑亦未足尽震川也。虽然，得其深者但见其精切，而不见其宽博也，此可为知者道耳。”（《六母舅后江周翁寿序》评语）

清代地位显赫的文人往往不看好归氏的寿序、赠送序等文类，其中尤以曾国藩最为激烈，他在《书归震川文集后》说：“内之无以立诚，外之不足以信，后世君子耻焉……熙甫则不必钱别而赠人以序，有所谓贺序者、谢序者、寿序者，此何说也？又彼所谓抑扬吞吐、情韵不匮者，苟裁之以义，或皆可以不陈。浮芥

舟以纵送于蹄涔之水，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。神乎？味乎？徒词费耳。”^①曾氏以归氏的赠序、寿序等文为“词费”，王元启则以为“变化处不可方物”，其间差别颇大。王元启等人所评或掺杂着更多个人的喜好，但他关注文章本身的内容及艺术，至少能促使世人更客观地评判此类文章的优劣。

四、庄述祖的评点

庄述祖（1750—1816），清代著名学者，经学、史学、小学及古文诸方面皆有成就。宋翔凤《庄葆琛先生行状》说：“时伯父侍郎公于五经皆有论说，彭恭人之季弟二林先生为文精深，先生皆取法焉。”^②《武进阳湖县志·庄述祖传》说：“述祖原本家学，研求精密，于世儒所忽不经意者，覃思独辟，洞见本末。著述皆义理宏达，为前贤所未有。”^③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庄述祖、彭绍升评点《震川先生集》一部，此书归玠识语之后录有庄述祖题识：“古人文字可正不可改，望溪逞臆妄改，此选有蹈其过者悉从原本。嘉庆丁巳息航识。”卷一首页有刘体仁识语一则：“朱笔临常州庄息航先生看本，先生名述祖。常熟本、昆山本俱用黄笔校，兼临南韵先生评语。”据此可知，庄氏对归氏散文曾进行过选评，此本中庄氏评语则为刘体仁过录。

由评语可知，庄述祖比较欣赏归氏中晚年的作品，尤其是看好归氏的经解文。《沈次谷先生集序》一文后有庄氏评语说：“在作者往往晚年之作视初稿如出两手，故编文者必论次年谱。先生文中年出入欧曾，上追《史记》，而情之所至，不假途于古辙，有自然造极之文。如《马政志》，晚作中之最大手笔，与《平准书》相颉颃。其余应酬之作，不过率率以塞诺而已。古文亦枯而少腴，情亦不甚挚，虽贤者不能不为吏事所拘迫如此，可叹也。今编先生文，为诸生、进士时为一类，自长兴、仆丞时为一类，与柳州文编不同，读者当自得之，每类文又分为甲乙两编。”他评《易图论》三文说：“三首是先生晚年所作，酝酿深醇，非仅规抚欧曾者比，选家当以此为准则耳。”庄述祖以经学知名，他对《易图论》等经解文的欣赏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归有光在经学方面具有较高的修养。

在归氏诸种散文中，庄述祖也关注到归氏的寿序类文章，认为可备文之一格。《邵氏寿诗序》评语说：“寿叙盛于明代，前此无之，此种文字，当以归先生为例，故全录之。”再如以下评语：“此文识解特卓，故酝酿亦深，与寻常应酬之作不同。”（《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寿序》评语）“结妙在不露，应酬文字中具有史法，非先生不能作。”（《顾夫人八十寿序》评语）“此首在寿序中不失古文

①曾国藩：《曾文正公文集》卷一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清同治刻本，第1537册，第538页。

②宋翔凤：《朴学斋文录》卷四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清嘉庆二十五年刻《浮谿精舍丛书》本，第1504册，第395页。

③王其淦等：《光绪武进阳湖县志》，《江苏府县志辑》第37辑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575页。

词体裁，自是先生本色。”（《仓州守孙侯母太夫人寿诗序》评语）“徵引杂沓，初看似不辞，然细玩之，其辞有哀焉，固先生所云颠倒不能成字也。此文旧选无之，今复录入集中，以其是作者真面目真性情，非牵率应酬比也。”（《晋其大六十寿序》评语）“诸序中之最佳者，妙在淡而有情。”（《浚甫魏君五十寿序》评语）“笔圆转而理深至，此种文字真令人不厌百回读也。”（《戚思呐寿序》评语）归有光寿序的对象大多并无奇伟节行，庄氏也没有过多地考虑文章中所寿对象如何，而更多地从文章本身来评价归有光本人的识见以及其为文的艺术，与其他很多以“应酬文”罪震川者迥异。

庄氏的评点还明显烙有桐城派文说的痕迹，但也多有逸出桐城派者，比如以下评语：“方云详序历官与传志体未合。此序极有关系，未可以望溪评正之。序体自诗书而下以刘子政《别录》为最。如管晏□序，皆历载其生平，唐宋以来大家文体所自出也。望溪先生于文章流别讲之甚精，独论此文未当。”（《玉岩先生集序》评语）“崇论宏议，特借题以发之。望溪先生谓为近套，未敢许为知言。”（《送阳曲王公参政陕西序》评语）“先生不喜良知之学，此文大畅厥辞矣，至云莫知其所以然，又云不知求其本心，固深契阳明之旨也。此先生论学之文，非寻常应酬之作也，望溪不选，实所未解。”（《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》评语）“全在琐碎处着精神。”（《魏诚甫行状》评语）此书目录后还录有庄氏识语说：“补录文五十首皆应酬之作为多，如画家随手点染，生趣洋溢毫素间，此为化工之笔，非寻常摘句家所能领会也。”他注重文章的“生趣”，重视文章的“全在琐碎处着精神”，这显然已非桐城派“义法”、“雅洁”等原则的范畴。

五、张士元的评点

张士元（1755—1824），字翰宣，号鲈江，震泽人，长于诗古文。洪亮吉跋张氏《嘉树山房集》说：“散文文远追六一，近仿震川。诗则王、韦之冲淡，苏、韩之奇肆，兼而有之。洵近日之宗工，江东之领袖。”^①张士元极为推崇归有光之文，其门人俞树滋在《张鲈江先生行状》中说：“发所藏归震川集读之，喜曰：‘真吾师也。’辄陈于案上，北面而拜之。寻又得震川所评《史记》，即用其法，上推之左氏，下逮班韩欧曾之伦，无不合者，由是深造自得，卓然成一家言。……独与长洲王惕甫、无锡秦小岍、新城陈硕士数公，以古文相切劘，而尤为桐城姚姬传先生所激赏，以为拟之震川无愧色云。……所辑《震川文钞》四卷。”^②据俞树滋此《状》，张士元辑有《震川文钞》四卷，但未见刊行。今上海图书馆藏有吴江李龄寿钞本，此本评点归有光文章近九十篇，书前有张士元《震川文选序》，序后有李龄寿题识：“咸丰四年甲寅十月后学吴江紫匏子李龄寿手录。”

序文认为归氏的文学造诣可以“力抗欧曾、气追班马”，其散文具有“二南

^①张士元：《嘉树山房集》卷前，清光绪四年刻本。

^②张士元：《嘉树山房集》卷前。

风度”：

盖古今文章，自汉氏以来，至唐之韩、柳而体始备，至宋之欧、苏、曾、王而法精，自宋迄元不绝如缕，惟虞道园之文犹有永叔、子固之风味。明正德、嘉靖间，唐应德、王道思相切摩以古学，唐学眉山，王学南丰，卓然大雅也。而其力抗欧曾、气追班马，如江汉之发源于岷嶓而滔滔不竭者，熙甫一人而已。余犹喜其叙述诸文中，世俗琐事，皆古雅可观。江阴杨文定公尝言，“文章要得二南风度”，如熙甫，其可谓得之矣。读之使人喜者忽以悲，悲者忽以喜，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。

他认为归氏于唐顺之、王慎中同时诸人中成就最高，详其评语，其成就一是由于“世俗琐事皆古雅可观”，再者是其写人能“各肖其人”，《玄朗先生墓碣》评语说：

熙甫为碑志各肖其人，如唐道度英伟，文便英伟。周孺亨谨饰，文便谨饰。归天秀精密，文便精密。元朗奇宕，文便奇宕。吴纯甫雅洁，文便雅洁。李思州清劲，文便清劲。文至此，几如化工之造物矣，而其源出于龙门，今观《史记》，未有不肖者也。先生谓文章天地间之元气，又评《史记》谓叙事中有气，益信。

张士元十分重视散文的社会功用，故特别注意到归氏赠送序类文章的“警策”意味。他在《与翁海琛书》中说：“观古人文章，虽详略不一，然大概所言者皆不可不言，即小题目亦必寻出第一等议论，归于警劝，有裨于时俗而止。至于言之无义意可思者，则弗言也。其牵于酬应，不得已而言者，则寥寥数语，无文字处，皆有意味也。”^①就其评语来看，归有光的赠送序恰恰被张士元视为轨范。比如，他评《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》说：“叙官独详于采木一事，盖李公无奇功伟略可书，而采办甚勤，又有关于国家雄侈之渐，故特细叙，使读者知李公生平，且可考见时事也。先生于李公最相得，然称许处尺寸铢两不爽，此少知大家法度矣。其布置处兼盲左、史迁之长，虞山谓韩欧握管亦不过如此，信哉。”另外，他评《送计博士序》时又概括说：“震川赠送序文篇篇有真实道理，或切官，或切人，或切地，而言外讽劝多妙，不比寻常酬也。”

本文所揭诸评点家的欣赏趣味不同，其评价角度也各有差异，但他们的批评无疑丰富了对归有光本人及文章的评识。不仅如此，这些评点材料本身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学术光点，将它们会通观之，必然也能深化我们对清代文学批评史的认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

^①张士元：《嘉树山房集》卷六。